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术文库
丛书主编 罗康隆

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以张家界为例

LÜYOUYE QUDONG MINZU DIQU
JINGJI SHEHUI
FAZHAN YANJIU

麻学锋◎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民族学特色优势重点学科学术成果
湖南省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重点学科学术成果
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与管理科技创新团队学术成果
湖南省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学术成果
湖南西部经济发展研究基地学术成果

LÜYOUYE QUDONG MINZU DIQU
JINGJI SHEHUI
FAZHAN YANJIU

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以张家界为例

麻学锋◎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 麻学锋著.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6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术文库 / 罗康隆主编. 经济民族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7-0867-2

I. ①旅… II. ①麻… III. ①旅游业—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张家界市②旅游业—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张家界市 IV.

①F127.864.3②F592.7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4729号

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以张家界为例

麻学锋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汤云辉

责任编辑: 张 鹏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火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10.25 字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0867-2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28)83202323, 83256027。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经济民族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罗康隆

经济民族学作为民族学分支学科，是民族学中与经济学对话的部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民族学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在经济部分进行关注的新兴边缘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经济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开始传入中国，经过近 30 年缓慢的发展，经济民族学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

第一节 经济民族学的内涵

一、经济民族学的定义

关于什么是经济民族学，不同时代、不同的学者各有自己的看法。能够代表早期对经济民族学普遍观点的经典定义是“研究远古人类或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其制度的一门人类学分支”。¹但是这一观点很快被否定。随后，实在主义、形式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广义主义各流派都提出了代表自我研究角度的学科定义。当今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当代著名的美国经济民族学家普莱特纳

¹覃光广等主编：《文化人类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30页。

(.Stuart.Plattner) 所认为的“经济民族学是一门从人类学角度、以民族志方式研究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学科”。¹ 这一定义注重从人类学、民族志和经济学三个方面来标示经济民族学,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学科定义的多变性正说明了经济民族学还是一门尚未定型的学科。不容置疑的是,学科定义将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成为经济民族学发展历程的一个标志。

二、经济民族学的“经济”

尽管经济民族学定义多变,但是肯定的一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经济民族学不同于经济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用整体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并不只是局限在对于“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分析视野中,而同时“经济抉择的合理性受到文化条件的深刻制约”²,这即是经济史学家波兰尼提出的影响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的“经济是嵌合(embedded)”的观点。因此,无论是实在主义还是形式主义,同样对于70年代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后来的新广义主义来说,所持的理论虽然不同,然而分析的视角却都是从社会生活的广阔层面来看待经济现象,从物质、制度、文化之网来阐释经济。不仅原始民族的经济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交织在一起成为显然的事实,即使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的西方社会,“经济”也不是经济学家眼中“纯粹的经济”,萨林斯在其对经济学中的生产、消费的分析中仍然能够得出经济是与文化因素的制约分不开的结论。³

1 Stuart Plattner edite: 《economic anthropolog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age1.

2 (美) 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 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5页。

3 (美) 马歇尔·萨林斯著、赵丙祥译:《文化与实践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在对经济的理解中，摆脱经济学单一的从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条件下产生的视角，是经济民族学最为重要的跨越。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经济的研究不再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种相对论的眼光。经济民族学将对经济的研究放置到整个人类发展历史过程来考察，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大进步。

关于“经济”的探讨实质从早期开始就涉及到了人的本性的问题，而经济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本性的学科再次将该问题提上日程。在经济民族学的争议中，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本性，即自利的、社会的、道德的。所谓“自利的人”是指人本性是自私的，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西方经济学从发展之初便认为人本质上是自私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的观点则成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社会的人”则在于说明人是生活在社会大集体中，人们的行为是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的。杜尔干和马克思等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来说明人同时是作为社会的存在，人的行动是考虑到群体行为规范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即为该学说的主要代表。“道德型的人”和文化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是受所属文化的特殊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所支配。人是融合于自我文化当中的文化人。人会尽力去迎合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或是非判断标准，而避免触犯文化。以上三种人性的划分在经济民族学中有着不同的拥护者，也正是这三种不同观点使得学科内部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美国经济民族学家威尔克在其《经济民族学基础中的经济与文化》一书中专门对经济民族学关于人性的看法做了总结，是较为全面的经济民族学人性本质分析。

第二节 西方经济民族学研究概述

一、经济民族学的兴起

经济民族学作为人类学一门分支学科的确立，历史并不遥远。1940年，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出版了以《原始人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命名的经济民族学著作，至1952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经济民族学：比较经济学中的一项研究》（*Economic Anthropology.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s*），成为“经济民族学”一词在世界上第一次标志性的使用。但是，经济民族学学科在美国的真正诞生，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环境大背景和人类学学科自身发展不断完善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

二战之后，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将自己的势力渗入海外，通过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手段扩大海外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将原始民族或乡民社会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许多落后的新兴民族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具有关注海外传统的人类学同样也开始将经济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分析传统研究对象的经济现象。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民族学的‘真实’历史，与人类学学科同样古老”。¹人类学最初的原始民族志的描述性资料中，就有许多关于经济领域的介绍。这些均被称为“经济民族史”。直到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库拉圈交换的专著描述，第一次将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作为一种典型的、独特的方式表述出来，吸引了众多人类学者的眼光，从而开创

¹陈庆德著：《经济民族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了经济民族学在欧洲的早期尝试。随后，其弟子威廉·雷蒙德·弗斯(William Raymond Firth)和古德斐罗(D.M.Goodfellow)等进一步发展了原始民族经济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前者在《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我们：提皮科亚人》等著作中，将原始民族经济的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为后来美国经济民族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极为繁盛，学科体系趋近完备，研究更为深入，并且与其他学科互动日渐增多。在借鉴前人关于经济民族史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人类学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并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关注于经济问题研究的人类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弗斯特(G.M.Foster)、波兰尼(K.Polanyi)、塔克斯(S.Tax)、列克莱尔(E.E.LeClair)、纳什(M.Nash)、闵茨(S.W.Minz)等陆续出版了一些专门的经济民族学著作。赫斯科维茨与波兰尼等人理论性的探讨，更将经济民族学推进学科深度地发展。赫斯科维茨等人将经济学的分析理论运用于对中南美洲、非洲等的研究，成为了早期的经济民族学形式主义的代。而波兰尼一系列著作如《大转折》、《我们应废弃的市场思想》等的发表则成为实体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也成为掀起六十年代争议大潮的思想来源。正是这一大批研究者的出现，经济民族学成为人类学一个显耀的分支学科在美国成长起来。

二、经济民族学的理论流派

经济民族学自诞生至现在，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学科从五六十年代的实在与形式的大争议逐渐走向多理论的探索。关于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日本的栗本慎一郎在其《经济民族学》一书中认为：“以波朗尼、多尔顿为代表的波朗尼学派(实在主义者)只是其中的一派，除此之外，至少还有：1，经济民族史及功能主义经济民族学；2，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民族学；3，新古典

主义经济民族学（纯粹形式主义）这样三个流派”。¹施琳在坚持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主张和利益诉求“四个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实在主义、形式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广义主义四大流派。²而实质上理论流派的划分往往见证了经济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据此，综合以上两者的划分，经济民族学历经流派可从以下五大方面加以介绍。

（一）经济民族史

论及经济民族学的起源，最早的追溯便是经济民族史的存在。经济民族史是人类学将研究焦点从宗教等转移到经济问题进行关注的起点，因此，它是以对原始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为基础的。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被认为是最早涉足经济民族学领域的人类学家之一，也是被美国经济民族学界所认为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库拉圈交易制度的描述成为经济民族史中最为经典的文本。库拉圈交易中流通着两种物品，一类是日常生活中有实在价值性的东西，如食物、日用工具等，另一类是称呼为库拉的礼仪性饰品：白贝壳手镯（Mwali）和红贝壳项链（Soulava）。手镯和项链是库拉交易的中心，两者呈相反方向流动，并在不断的循环流动中树立其社会声望等级，推动着实在价值性物品交换的持续进行。马塞尔·莫斯（Mauss.M.）对于原始社会的交换制度有着专门的研究，在《论馈赠：古代社会交换的形式和功能》中，将原始社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如库拉、夸富宴（Potlatch）等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并与政治、宗教等联系起来，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弗斯同样也是经济民族史的代表人之一。但是有着经济学背景的弗斯并没有循老师的观点而行，而是将人类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试图

1（日）栗本慎一郎著、王名等译：《经济民族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页。

2施琳著：《经济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原始社会的经济行为和制度。他为后来形式主义经济学开拓了道路。

这些早期的经济民族史的描述都带有极为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他们的学术观点和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为后来美国经济民族学提供了极具参考性价值的信息，并影响了后来许多经济民族学学者的学术倾向。

（二）实在主义学派

实在主义学派是与形式主义学派相对而言的。它对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主导的经济学研究的挑战成为经济民族学研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实在”意义的提出与其创始人美籍匈牙利犹太学者波兰尼分不开的。作为经济史学家出身的波兰尼，在广泛接触到人类学中人类早期社会经济史的描述时，逐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特殊现象、人类经济形式的多样性是普遍存在的看法。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一书中，波兰尼提出了经济的“实在”与“形式”两种涵义。经济的实在涵义来源于人为了生活而对自然和他人的依赖关系，而经济是指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交换，这种交换为人提供了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经济的形式涵义则来源于以“经济性”“经济化”等术语表示的“手段—目的”关系的逻辑特质，此时经济所反映的是人们在稀缺性资源的若干用途间进行选择时的一种明确的情况。¹波兰尼对经济思想的两种划分确立了实在与形式两大学派的雏形。波兰尼主张一种实在主义的研究，强调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经济形式的差异性，主张经济是嵌合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所以不能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古代经济。他提出了社会交换的三种形式：互酬、再分配、市场交换。这三种交换方式构成了“社会整合模式”的理论。波兰尼的

1 K. Polanyi, Arensberg and Pearson(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 Economic in History Theory,》 The Free Press, 1957, P.243.

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其弟子乔治·多尔顿成为实在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 60 年代的大争论中，成为实在主义一方的中坚力量。另外保罗·博汉南及萨林斯等都成为实在主义学派的学者。

60 年代美国的经济民族学界，实在主义成为一面大旗与形式主义争相抗辩，共同推动经济民族学向前发展。波兰尼作为实在主义学派的开创者，称为经济民族学史上最为闪耀的一位学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是波兰尼让经济民族学学科真正确立起来的。¹实在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用现代经济学看待经济现象的固有模型，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使得波兰尼为代表的实在主义学派也是被中国学者介绍得最为广泛的一个学派。

（三）形式主义学派

形式主义被认为是经济民族学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和人数较多的一个学派。²从弗斯开始，将西方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原始民族的经济研究，成为经济民族学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倾向。四五十年代，美国最早的一批经济民族学家如赫斯科维茨，六七十年代的列克莱尔（Edward E. LeClair）、库克（Scott Cook），八十年代的斯内德尔（Harold Schneider）和九十年代的普莱特纳等，都是擅长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制度的杰出代表。从波拉尼所区分的形式涵义中，树立了形式主义学派的基本取向。但是，形式主义内部实质也无完全的统一性。因此，陈庆德在对形式主义的分析中认为形式概念的涵义至少经历了三次转换：最初是指可量化的，即源于韦伯的易于测算的涵义。其次，是指从边际效用经济学中衍生的假定所有人对供求力量都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反应的普遍性涵义。最后，是指理想范式，并作为在特定条件下所持的一系列假设。³不同的形式主义者倾向于不同的涵义取向，但是不同程度

1李富强：《经济民族学简论》，载《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2施琳著：《经济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3陈庆德著：《经济民族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113页。

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是所有形式主义者的共同特点。

毫无疑问的是，形式主义的研究将经济民族学更多地与现实接轨，在原始社会日趋消失、市场、货币全球化通行的时代将经济民族学向一门应用的经济民族学研究转向。形式主义运用一种跨学科的手法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人类学中的经济研究中，从该点来说，是适应了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受到批评的一点是，没有考虑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西方经济学学科的限制性而毫无限制地使用经济学模型或原理，有陷入缺少对民族中心观批判与反思的危险。

（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中得到再认识。在经济民族学发展史上，继60年代大争议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民族学迅速升起为备受关注的一颗明星。一般而言，新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另一派为美国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

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Althusser, L.）、戈德利耶（Godelier, M.）、梅拉索耶（Meillassours, C.）、特雷伊（Terray, E.）、雷伊（Rey, P.）等为代表，他们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生产方式的研究，主张将生产方式的划分运用于解释各类经济形式，同时，他们明显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试图用寻找深层结构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出解释。由此，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和著作，如戈德利耶出版了《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展望》、《经济民族学的对象与方法》等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探讨的经济民族学著作。

政治经济学派是影响比较广泛的一个学派。在美国和英国人类学界都有众多的研究者。主要代表人有沃尔夫（Wolf, E.）、哈特（Hart, K.）、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等。政治经济学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重视对特定社会与更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整体性研究。沃勒斯坦从建立世界体系学说出发，

将第三世界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强调一种整体的眼光。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一书将传统人类学研究中封闭的社会放置于世界体系大框架中,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作出了宏观意义上的描述。哈特是美国经济民族学界较具代表性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民族学家。他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研究了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民族学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如果用广义的定义来界定经济民族学,那么卡尔·马克思堪称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经济民族学家。¹

(五) 新广义主义学派

新广义主义学派是经济民族学研究从狭隘走向包容的一个重要表现。经历以上几大学派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哈罗德·斯内德尔等人在美国创立了经济民族学会。在经济民族学会的凝聚下,许多学者总结前人成果,吸取学科发展教训,不再将视野局限在某一学派或某一理论,而是从丰富的学科理论中吸取精华,择取自己所需。这些具有广阔研究领域和多重理论观点的学者被称为新广义学派。²新广义主义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为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Wilk),在其代表性著作《作为经济民族学基础的经济与文化》中,威尔克从各个角度总结了70年代后经济民族学的新动向,最后将经济民族学深入到人的本性的分析中,成为一种学科的哲学探讨。新广义主义研究倾向的出现与经济民族学寻求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分不开的。在各学科呼吁跨学科、多层面研究的今天,向广义层面的发展是经济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1 Ortiz Sutti edite: 《economic anthropology :topics and theorie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and 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 Co -published, P.96.

2 施琳著:《经济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经济民族学

一、早期经济民族学在中国的研究

(一) 早期“他者”对中国的经济民族学研究

经济民族学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原始民族经济交换领域的关注之上，作为人类学对象具有悠久历史的印第安土著、太平洋岛屿、非洲大陆等原始小型社区同样成为最初受经济民族学者欢迎的研究地域。而对于具有复杂社会结构的中国，研究则不是太多。最早的对中国的经济民族学研究可追溯到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对中国城市和乡村区域经济体系建构的经济区域模式。

20世纪40年代末，施坚雅在中国四川地区经过田野实地调查后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农村集市贸易的资料，他试图纠正传统人类学注重村庄内部而忽视外部联系的倾向，认为农村并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社区，而同样是作为一个流动的、与外联系的实体存在，农村基层集市是地方市场系统的三层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在此基础上，施坚雅后来把早期分析模式与史料结合在宏观视角上将中国划分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九大经济区域。他在利用传统人文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基础上对其加以修正，提出晚清帝国在中心城市和联合的地方体系中存在两个等级结构：“其一产生于从事帝国行政管理的官僚集团；另一个最初则是在经济贸易活动中形成。前者体现了中国“法定的”官僚政治结构，由各级衙门和大小官吏构成，上下有序，等级森严。而后者反映了中国社会“自然的”结构，包括市场及贸易体系，民间政治活动，以及由退職官吏、乡

绅、豪商所操纵的特殊社会群体。”¹行政首府虽然常处于经济中心的位置，但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经济中心的存在，行政区划的界限与贸易区域的界限并不完全一致。在“需求极限”和“利益区域线”两大概念分析下，施坚雅得出的区域经济的等级结构模型是一个六边形呈蜂窝状的网状结构。

虽然施坚雅对中国的研究在西方并没有引起经济民族学同行的注意，而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史学家对中国晚清农村的研究。但是中国学者在对其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与批评之时，大都将其归纳为对中国的经济民族学研究。²中国的经济民族学研究者在追溯中国经济民族学的历史时，也大都将其列入其内。可以代表一般学者观点的是：“他（施坚雅）实际上是主张可以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用于解释和分析像中国这样与西方差异极大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过程。因此，应该可以认为，施坚雅是一名对中国研究情有独钟的形式主义学派的经济民族学家。”³

80年代，黄宗智利用30年代日本侵华期间对华北平原农村的调查资料(简称“满铁资料”)运用经济民族学视角出版了《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并同时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民族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⁴在书首，黄宗智重点总结了有关中国农村、农村演变、农民研究中三大学术传统即经济民族学中实在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流派，提出革命前对华北农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必须综合以上三者的分析视角，华北小农既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又一定程度上又为市场而生产，卷入了商品经济当中，同时也作为一个

1 (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

2 王铭铭著：《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125页。

3 施林著：《经济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4 (美)黄宗智著：《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第1页。

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剩余产品被剥削。他将格尔兹在对印尼爪哇农业的分析中提出的“农业内卷化”概念引入到对晚清帝国时期中国华北小农生产的描述中，成为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一个模式。

（二）早期中国经济民族学的研究

由于中国人类学整体学科二十年政治原因的断裂以及经济民族学自身学科的晚起，中国学者对经济民族学学科的了解相当晚近。在大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学者开始陆续翻译西方经济民族学作品，将经济民族学零星介绍于中国学界。总的看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经济民族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八十年代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前的研究，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1973年荷兰人类学出版社编辑出版《1940—1972经济民族学著作简介》一书，费孝通1949年完成的著作《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亦在其列。而这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费孝通对于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只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村社区现状研究的意图之上，当时并未将其视为经济民族学的专门研究。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是从解决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试图提出解决中国农村贫穷现状的方法，为此，他发表了《江村经济》等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著作。这一思想贯穿了他整个一生的学术追求，正因为利用人类学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关注，所以后来的学者认为他“开创了人类学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先河”。¹

与外接触较为密切的港台地区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则比中国大陆要早许多。台湾学者徐正光最早在1970年在台湾杂志《思与言》上发表了《经济民族学的若干问题》一文，1974年被选编入李亦园所

¹吕俊彪：《经济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当前面临的问题》，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编的《文化人类学选读》一书中，成为较早介绍经济民族学的作品。在文章中，徐正光分析了经济民族学传统研究中的实在主义研究。同时他描述了原始人同样具有个人主义经济获利的思想的形式主义研究。关于乡民社会的研究他也有所论述。在最后对实在与形式之争的描述中，他偏向于形式的研究。

八十年代，是经济民族学作为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初步引入阶段。学科恢复之后，经济民族学逐渐被翻译或介绍进来。经济民族学的文章陆续在《国外社会科学》《世界民族》等专门介绍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杂志上被翻译，如1982年R·波斯纳的《经济民族学和经济学》，1982年G·达尔顿的《经济民族学展望》，沈肖肖1984年翻译的《经济民族学》，1985年高野平次郎《论经济民族学家卡尔·波拉尼》，1985年A·小艾伦德《经济民族学》，1989年C·西摩·史密斯的《经济民族学》等都属于早期对经济民族学的初步引进。这一时期经济民族学主要以翻译为主，作品简短，内容浅显，很少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¹但是，经济民族学已经初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一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著作中，经常会提及经济民族学。1988年在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人类学辞典》中就对经济民族学作了介绍。

到九十年代，经济民族学在中国跨入了学科的早期研究阶段。对于经济民族学更深入的介绍和初步作为独立的学科探究倾向已经出现。其中一些中国学者或学生开始将经济民族学作为一门值得研究的人类学新兴分支学科加以介绍。由于中国人类学传统意义上是以民族学为基础的，往往经济民族学也成为经济民族学的代名词。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背景是一些以前置身于中国本土生长的经济学学科——民族经济的学者开始投入经济民族学的研究当中，他们成为早期经济民族学的引进者。

11982年王祖望在《国外社会科学》中发表了一篇《经济民族学与波拉尼学派》的文章，对波拉尼学派简单作了介绍，这是中国学者自己最早有关经济民族学方面的文章。